

## 东方-西方，西方-东方

宗萨钦哲仁波切开示

一位纽约的朋友最近电邮给我一篇题为“藏传佛教在西方是否可行”的文章。尽管我对这篇文章的第一反应多少有些自我辩护，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位作者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对这场看似没有尽头的争论，如果我再加上另一个观点，貌似有点徒劳；但早在现代文明庆祝言论自由的胜利以前，佛陀就十分看重对理性思考的尊重，强调我们必须检验修行的道路，而非盲目追随。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即使在这个所谓的“现代”社会，盲从的信仰不仅存活着，而且还颇具活力，



甚至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仅仅因为某位教士宣称为他们去天堂打包票，人们就愿意为之放弃生命。甚为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实践言论上的自由，以检验修行之道及其权威性，而且我们还必须提防与之俱来的文化包袱。对这个文化，我们需要接受多大一部分？作为西方人，是不是就缺乏作佛教徒的要素？或者，这些“上师”们是不是非得将法教折衷以迎合西方人？

多年以来，西藏的上师们在西方赢得了不少欢心，这主要应归功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佛陀精巧的智慧，也归功于他们中许多人看起来温文尔雅，而且喜乐。另外，西藏上师已成为濒危物种这个事实，也有助于他们在西方大受欢迎。更何况还真有

少数真才实学的上师可以用来作橱窗展览呢！然而，最初的迷恋已经到头了，而且，一些西方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佛教与西藏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

在现代传媒的辅助下，当社会态度发生变化时，对公众人物的聚焦以及对所谓的灵性道路的怀疑也开始增加了。前所未有的，普通的藏人，特别是上师们，开始被迫尝到了自由社会的甘苦。他们中有些人痛苦的认识到了这一点：受欢迎和获得成功，需要付出代价。另外，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藏人开始接受这个事实：把他们认为是更高等的生活方式强加给西方人，这种尝试是行不通的。然而，就像许多其它东方人一样，藏人仍然紧紧抓着他们所有的文化传统，甚至包括那些从藏人的利益角度来考虑都应该被摒弃的文化传统，作为对一切的最终答案。就这样似乎还不够，更有甚者，许多西藏上师坚持要求，他们的弟子们在接受佛教的同时，也要全盘接受西藏文化的全套包装。这个佛教与西藏文化的大杂烩，实在让许多人难以消化。

在今天，由于缺乏足够的诠释，即使是像皈依这样的基础佛法教授都被当成有神论了。当我们念诵像“我皈依佛”这样的祈请文时，我们极少提及，从而忽略了祈请文的本质含义，比如了解我们的根本本质即是佛。在这样的情形下，难怪那篇文章的作者会用“捕捉者”而非“解脱者”来形容上师及僧众。由于上师们承担着将佛法传播到西方的任务，因此比起那些对佛法感兴趣但并不熟悉佛法的西方学生们，上师们对法教负有更重大的责任。但是，西藏上师们非但没有将法教变得更容易获得和理解，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由于他们的极具优越感的偏见，由于从根本上缺乏对西方人的“尊重”，由于对西方人的思考方式兴趣缺乏，这些全都导致了西藏上师创造出了与西方学生的巨大隔阂。

有一个关于病人，医生以及治疗的传统佛教比喻：不同的病人各有其迥异的问题，因此医生需要对症下药来诊治。但如果西藏上师将西方学生的文化和习惯嘲讽为“彻头彻尾的浪费时间”的话，治疗要如何生效呢？他们是否真建议西方人应该跟不识字的西藏牧民一样，获得同样的教授？这种对西方人的缺乏尊重不是最近才有的，藏人们由来已久的认为，西方人是蒙昧野蛮的。甚至在1959年以前，只因为他们的外国人身份，许多游客被拒入境西藏。有人认为，藏人失去了他们的家乡，最应归咎的是他们自己：他们的极端排外，以及认为一切外来的事物都是“不圣洁的”，从而蔑视和拒绝所有外来事物的这种态度。但即便如此，很多西方人仍为藏人的热情，彬彬有礼和友善所倾倒。虽然藏人的这些表现更多是出于社会义务而非出于真诚，但西方人对此一无所知。在大部分藏人的笑脸背后，仍然有“你是个西方人”的潜在心理。而那些少数的真诚笑脸，很可能是缘于希望你能资助他们，或者最近的趋势是，希望你能帮助他们获得绿卡。

那位作者还提出了另一个让人无法忽略的评论：这些“上师”们的牢骚总是老调重弹，让人大打哈欠。藏人不单认为西方人对佛法的追求是“肤浅及善变的”，而且认为这种追求只是投石问路而已；他们忘记了这种研究的态度正是佛陀所鼓励的。你越分析研究佛法，就越发现它的伟大之处。

此外，对普通的藏人，特别是一部分上师来说，对物质的追求已经成为了首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把西方人贴上“物质主义”的标签实在是有点荒诞。各大西藏难民营什么都彼此攀比：从最大的寺院到最新款最名牌的轿车。要是某些高阶上师愿意把他们的金银茶杯垫卖掉，就能为成百上千的埃塞俄比亚饥民提供好些日子口粮。

藏人们认为西方人“选购佛法”，认为西方人不能保持密续教法的隐秘性，这些都是事实；但问题是，如果“上师们自己把佛法搞成一场巡回演出”，包括展出像沙坛城及金刚舞这样的表演，难道真的只有西方人该受到责难吗？

如果我们尽早的能够发现藏人的所有软肋，会更有帮助。否则也许我们可能会因为幻想破灭而放弃整个佛法。但发现这些软肋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由于一代又一代的虚伪矫饰的经验，这些上师们已变得相当狡猾和精于世故。举个例子，无数西方人被上师们近乎烦人的谦卑的表演所迷倒，而很少人知道，在这些谦卑的面纱背后，隐藏着争坐最高法座的激烈斗争。这种斗争已经严重到了这个地步：某些上师已乐意跟他们自己的老师平起平坐，或者坐在比老师更高的法座上。当与会的人数众多时，特别是如果有来自台湾的信众（他们似乎很看重上师的阶位，或者看重上师的名字前有多少个“H”，全凭这些来判断一位上师的价值），这种勾心斗角的竞争变得格外剧烈。

佛陀在摩揭陀的街上托着钵赤足而行的谦卑形象，业已成为了一个单纯的神话。上师们在西藏的影响力和主宰权，不仅“削弱”了西藏人的世俗生活，比如艺术，音乐和文学这些上师们并不感兴趣的东西，同时还在一定情况下使佛法堕落了。要不是因为佛陀的无神论的根本见地，这些心胸狭隘的上师们的统治手段，有可能跟塔利班一样残暴专断。

尽管西藏上师们强调应促进各教派合作的态度，许多人却仍鼓励宗派主义，霸占性的看管着他们的藏人弟子们，反对他们学习其它教派传承的法教。当然喽，他们总有一个老生常谈的理由：如果从学于其它教派，他们的弟子们会被弄糊涂的。由于

这个原因，许多藏人弟子对其它教派传承完全一无所知，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们诋毁其它教派。仅仅这样对待藏人弟子，上师们似乎还觉得有欠满足；他们还训练他们的西方弟子们参与这个宗派主义的游戏，并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同时也满怀戒心，疑忌的看管着他们在西方的佛法中心，尽管很多佛法中心仅仅被用来为这些上师和他们的驻锡寺院提供经济上的支持。真要说支持真诚追求佛法的西方弟子，或辅助他们的修学，这些目标并不是这些上师的主要兴趣所在。

如此说来，藏传佛教是否真在“蒙昧蛮荒”的西方“可行”呢？答案无疑是确定的。佛教传入蒙昧蛮荒的西藏，并且繁荣昌盛，就是一个明证：即使存在由于个性差异和异国文化所致的种种过失，佛教在各个国家，在不同性别和文化背景下，都有能力做到，也仍然是切实可行的。如果像那位作者一样，仅仅由于少数藏人行为失当，或者由于他们看似“复杂难懂及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就把整个佛法给摒弃了，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记住这一点很重要：西藏人花了很多年，通过好几代人的极富勇气和虔信的努力，才将佛法稳固的建立在西藏社会中。那么，我们凭什么期待在西方社会建立佛法就会迥然不同呢？

此外，从唯物主义者的角度度量佛法的价值，或者基于所谓的客观观点而傲慢自大的论断佛法，都是很危险的。诸如飞机能飞和轮船不会沉此类的客观现象，确实能很明显的被观察到；但谁能断言一个人是否已臻证悟之境呢？与此类似，当我们比较不同的社会体系时，也应该小心谨慎才是。那位作者评论说，“美国的社会治理体系遥遥领先于藏王赤松德赞的社会体系”，这实在是判断失误。在美国治

下，成千上万的美洲土著人被屠杀，更别提“社会治理”了。相形之下，藏王赤松德赞极具远见的看到了佛教的社会价值。他将佛教从印度这样一个跟西藏罕有共同之处的国家引入到了西藏，并克服了无数的挑战，



例如来自热衷献祭的苯教的敌视。如果不是他的创举，西藏人也许会接受当地部落的残忍嗜杀的生活方式，或者接受来自邻国中国的所谓文明——曲意奉承的儒家思想。

更进一步地说，那位作者断言西方社会“深刻的理解了作为菩萨意味着什么”，并将之与“人道主义”或者“社会运动主义”做比较，他全然误解了佛教的要义。菩萨的誓愿，超越了对“贫困的”或“无助的”众生的单纯的同情心。那种仅出自同情心的慈悲，将不可避免的让人变得依赖外缘，产生不安全感，并最终导致自我中心，因为最终人总是以他提供了多少帮助来定义自身的价值。与此相反，菩萨们并不执着于他们助人的行动或者结果；他们的目标，是将众生从轮回的陷阱和自由的迷思中解救出来。

于是有人会好奇：那么菩萨们应该体现出什么样的行为举止呢？温和？宁静？谦卑？苦行？责备上师们追求物质的不当行为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信不信由你，成为他们看似有实益的纯朴个性的牺牲品是一件更容易的事情！这种虚伪是最常见的假面具。我可以很轻易的看到，我自己就是让那位作者对西藏上师美好的幻想破灭的那类上师，因此在许多场合，我常常无法抑制的感到自己的全然虚伪。

尽管我写了这篇文章，如果有人供养给我，不管是高法座，还是名牌鞋子，甚至是四十九辆劳斯莱斯汽车，我知道我还是不会放弃这样的特殊待遇的。

上师们虽理应断离贪欲，但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享受着所有能想象到的特权；这看起来似乎冒渎而且堕落。与之类似，当一个理应慈悲善巧的上师表现得专断而心胸狭隘时，看上去也是不对的。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单纯生活的表象也是很有欺骗性的。听起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如某些人发现他很难放弃世俗的东西一样，另外一些人则极为担心他们将会失去苦心营造出来的单纯、出离和毫不在乎的狂智的个人形象。若一个人只为了保持谦卑和纯朴的形象而放弃世俗的享乐，难道不是痛苦且徒劳无功吗？这样的人不仅在灵性的道路上所行不远，而且在整个过程中，他错过了许多世俗的乐趣。这样看来，如果他们在利益众生的事情上表现得私心很少或者并无私心的话，我们就不应该谴责那些表面上看似追求世俗享乐的少数上师或者修行者。

我们应该尊崇并效法他们这种丝毫不为旁人的意见所动的态度：例如别人赞美他们的纯朴，或者抨击他们追求世俗享乐的丑闻，他们都全不在乎。我们还应尊崇并效法他们这种态度：不论是因谦卑的表现而赢得弟子，或是因过失而失去弟子，他们也都毫不在乎。至少我们应仰慕他们这种不虚伪矫饰的态度。而我跟他们不一样；要说克服这种假谦卑的虚伪矫饰以及达到发自内心的毫不在乎，我感觉我自己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对我来说，出离心，谦卑，以及脱离世俗，仍然是我修行道路上的主导原则。但这可不是因为我看透了世俗生活的徒劳无益；这只是碍于我是“藏传佛教上师”，通常普罗大众都认为一位上师应该具有例如谦卑这样的美好品质；而我又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尚然如此，无论我们怎么论断，都总是徒劳的。

这并不表示论断别人在道德上或者政治上就是不正确的；而只是说，主观性是一切论断的真正核心。

— *D.J. Khyentse*

—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